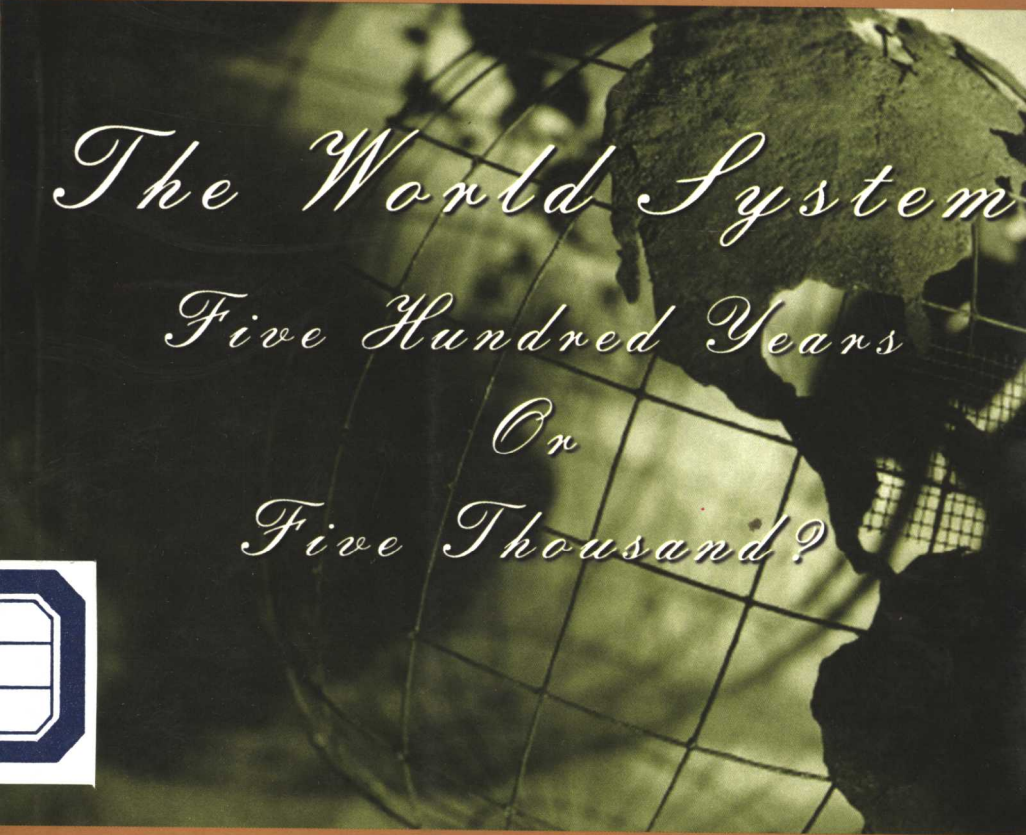
全球化译丛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 吉尔斯　主编
Edited by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球化译丛

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 吉尔斯 主编
郝名玮 译

Edited by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全球化译丛·

主　　编 /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 吉尔斯
译　　者 / 郝名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国际文化事业部
(010)65140868
责任编辑 / 王　静
责任校对 / 杨慰琴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 / 15
字　　数 / 353千字
版　　次 /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080-4 / D·02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01-2003-6386号
定　　价 / 30.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球化主题书系总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

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90 年代以后达到了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简直成了生活中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之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陆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及对策等做出系统的研究，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全球化理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ranational theory）。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做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做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从全球化研究的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国别的研究领域。在21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它将一直是各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谢寿光社长及其领导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推演主题出版新理论，雄心勃勃，力图成为发表国内外全球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主要出版社，成为展示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重要平台，在近些年集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和译著，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包括《全球化译丛》、《全球化论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并协办、联合主办了一系列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年，北京）、“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年，河北）、“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武汉）等，先后邀请了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大卫·赫尔德等数十位全球化问题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讲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作为这一全球化主题系列书系的一个编者，我衷心地希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能够在广大读者、作者和译者朋友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地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使书系越出越好。

俞可平

2003年6月9日

中文版序

我们的书能译成中文，我们深表愉快和深感荣幸，现在我们能在这篇专门为此撰写的序言中向中国读者谈谈。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高铦教授提出译书的倡议并负责推动中文版面世，我们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担出版此书，我们还特别感激郝名玮教授努力地、很好地翻译了这部相当难译的书。

我们借此机会请中国读者做三件事：（1）简要回顾西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考古及史前研究著作中的有关论点；（2）谈谈本书写作十多年来我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他人的进展；（3）考虑一下后者如何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本书原稿中提出的现实与方法论的观点，并把本书有关过去 5000 年的内容更直接地联系当今关切的问题和可预见的未来。

一　整体关系中的世界体系

我们的著作和论文特意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可能的话也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这方面它们大大不同于西方、中国以及其他各地大多数得到承认的研究、教学与理论，后者都是本地的，地方化的，时期短暂的，而且往往是特意这样做的。全世界学校的历史教员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支付工资去向孩子们、然后向成人灌输国家民族主义，或者不如说是非单一民族（除极少例外）国家中装扮成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经济统治。同样地，史

前研究在考古学家手中则是受雇去挖掘废墟、人工制品和残骸来以此声称“这块土地是我的”，自从上帝在远古把土地赋予我们光荣、神圣的先辈以来，情况就是这样，并把他人根据种族清除而痛苦地赶走。西方和中国的考古学在各处考古发掘上相互类似。西方考古学特别在西南亚、北非和美洲主要遵循或者甚至超过西方殖民时代的做法，而中国考古学则先在中国大陆然后在台湾和东南亚遵循汉化的步子，俄罗斯和苏联考古学则在西伯利亚和中亚追随俄化。当代政治在选择研究地点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和/或殖民主义决定了地点的能否准入。例如，两个世代的苏联考古学都是由切尔尼赫研究论述的，本书在这方面根据的是切尔尼赫，而苏联考古学几乎完全限于苏联控制下的地区，不管这些地区可能同其他值得分析的地点有密切关系而恰巧处在外界的冷战控制之下。史前研究的另一个相似之点是考古档案本身对研究者产生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这种情况。石制建筑和装备比木制的好，陶瓷比天然纤维的好，金属比其他材料好得多，干旱气候比潮湿的好，沉船比其他海难好，更不用说比毁损散架的好了。而且，曾经留下的或埋葬的东西必须仍旧留在那里而不因世世代代当地或邻近人们为寻找贵金属、宝石或者甚至只是建筑材料而遭到盗挖，特别未曾受到西方博物馆为保存人类遗产而进行过掠夺，诸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边敦煌石窟中的许多珍品。该处后来被西部历次战争炸毁。我们的研究依靠这一切作为二手材料，但这也通过现有的文字记录、特别是以文件证明的或者必要时推断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加以引申。我们试图考虑气候条件与变化，但必须做得更好些。我们做了微弱的努力来关注两性关系，而许多人对此却毫不关注。例如，与吉姆布塔斯/艾斯勒理论所认为的父权制是由野蛮好斗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向西传布的看法相反，我们引述证据说明中亚游牧民族要比它们周围不开化的

社会在两性关系上总的说来较少不平等，而且妇女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也较多。高世玉（音译）和刘汝珍（音译）重要的中国研究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表明在汉代时，西北邻国的妇女地位高于中国；以及在唐代、辽代和元代，游牧民族的影响提高了当时的妇女地位（上述两例均见闵家胤编，1995）。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同行发展这项研究。我们对于否定不开化地区的论点持严重怀疑态度（弗兰克，2001，2002），这种论点在西方、中国及其他地方得到承认的史学和史前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向任何人挑战，看谁能找出一个过去或现在在时间、地域、文化或社会方面具有可以辨认的（更不用说未受触动的）始末的这种文明。在有人能找到以前，我们还是主张研究一个由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部分所组成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整体。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识别这个（或几个?）整体并全盘地加以分析。这项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识别一个网络或体系中的联结和联系。这些联系可以是任何种类的，包括从属于同样的力量并且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启发性研究的问题是：是否这里的A和它往常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还是不一样，以及在存在或不存在同那里的B相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由于它同AC或同C的联系而不同，因此A与C可以通过与B的相互作用而依此相互影响。

从任何点到另外最遥远的点向外追溯这些联系和影响时，就开始在特定时间描绘该整体及其可辨认的界限。在任何一个时间和最终在每一点时间尽量在全球进行横向结合的史前研究，确实提供了该整体/体系的一个方法论定义：它表明这里的A如何和遥远的B以同样的调子运作，在同样时间扩展和收缩。这种共时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同一气候变化的共同反应，可是那总是有社会协调的；或者是由于社会关系，诸如贸易、战争、文化扩散等等本身。这些关系可以纲要性地用一系列互有联系

的椭圆链来加以描绘，这些椭圆链每个都有大、小城区或绿洲中心，它们在椭圆内和椭圆之间就像在网络中那样依次相互联系，有着较大的、相互联系较广的城区点和较小的、联系较少的城区点。经验似乎说明，整个体系的扩展根据研究者偏好何种标准而有所不同。本书撰稿人之一戴维·威尔金逊是位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他偏好社会—政治问题中的政治关系（往往是军事关系）。所以，他把他所谓的中央文明出现的时期上推至公元前 1500 年，并始终认为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出现得更早，散布得更广；因此他可以接受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一个单一的系统整体早已存在于 1500 年前，即公元前 3000 年；他还鼓励我们向更早更广的方向进行探索。军事关系也广于政治控制，虽然它们扩展得不如经济关系那么深远。军事关系往往被用来推进经济关系或者至少去塑造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诸如建立殖民地或者取得原料或市场，最多的情况是对商路进行控制。

一个主要的例子是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弗朗西斯·特加特在有关它们相互关系的重要研究中（1939 年）说明汉代中国政治政策与事件的变化为什么不断对罗马立即产生政治、经济的反响。当然吉本的著名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19××年）未能归因于同样的结果，只是由于阿提拉领导的“野蛮”匈奴人的到来，而未能分析从汉代中国西北边疆延伸到罗马的一套多米诺骨牌中，如何和为何每张倒下的游牧民族骨牌也向西推倒整个亚洲的下一张骨牌，直到最后一张骨牌也推倒了罗马，罗马已经被同样的大陆经济力量所削弱，这种力量同时也削弱了汉代以及贵霜王朝的印度和安息人的波斯，包括把它们都联结起来的跨中亚丝绸之路。

我们主要的分析手段和有关论点在本书绪论一章中提出了，可以在此简要综述一下。

1. 存在一个欧亚范围的世界体系，它未曾得到承认，要是

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只被西方、中国和其他学者同样忽视或干脆否认。

2. 在这个体系中，变革和转型的动力现在是、而且长时期以来一直是竞争性的资本积累，据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大多数学术界认为这种资本积累直到公元 1800 年以后才开始，或者最早在公元 1500 年开始。我们表明同样的进程实质上有几千年之久，并表明了历史的推动力，甚至一些史前的推动力。

3. 我们可以在该体系内识别中心—外围关系，虽然不一定有一个单一的系统中心及其外围。

4. 在该系统内部矛盾时的扩张和争斗期间可能有其他的霸权时期，但是我们研究越长，我们就越相信霸权要比以前认为的更为局部和罕见。

5. 虽然资本积累为时非常久远并仍在进行中，它却是不稳定的。相反，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变革是周期性的。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指明扩张期 A 和收缩期 B 可上推至公元前 1750 年。然后，弗兰克（1993 年）追溯这一周期特征达一千多年之久，即公元前 3000 年。现在弗兰克和汤普森把它进一步推前到公元前 3000 年和 4000 年，其他学者也试着这样做。

然而，本书各章的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不同观点。赞同这些论点的有本书编著者弗兰克和吉尔斯，撰稿作者弗里德曼、埃克霍尔姆和威尔金逊。反对此论点而主张更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有阿明和沃勒斯坦，试图两者兼备的是阿布-卢格霍德。

除了这些我们之间仍在进行的争论以外，还有若干突出的问题。

印度次大陆在这整个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到大约公元前 1750 年，但它似乎从考古记录中消失了整整一千年直到在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重新出现。怎么会这样呢？关于中国与延伸至地中海到大西洋的非—欧—亚体系的联结的坚实证据只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才出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地方事件之间的这些关系是在孔夫子和道家一生中发生的，它被卡尔·贾斯珀斯等人称之为“中轴时代”，他们注意到其他主要的宗教和哲学运动也是在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同时在所有欧亚地区产生的，包括佛教、琐罗亚斯德教、耆那教、毕达哥拉斯主义、爱奥尼亚哲学，以及主要的希伯来先知以西结和第二位以赛亚。别人已经提出这种时间上的共时性可能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则认为它们是对全欧亚地区千年中叶经济收缩共同状况的类似反应。然而，从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联结证据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中国当然不是现在的中国。许多民族——定居的、游牧的、汉族和数不清的其他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走到一起，大部分时快时慢地汉化和中国化了。我们现在认识的中国和中国人就是这一长期的、仍在进行的过程的结果，这包括了向东南方向扩展到以前蛮荒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也不是一个经常的进程，因为它也有加速和减速的时期，甚至有后退的时期，也从现在称为东南亚的地区。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熟悉程度仍然太有限了，它几乎无关于其各阶段如何与亚洲大部分地区趋向西方的阶段相合（但请参见下一节中有关更新近的著作）。我们在中国和东亚缺了些东西。希望本书在中国出版将鼓励我们的中国同行去探索这些问题，找出早得多的系统关系的证据。请记住考古学的、确实科学的说法是：找不到证据不等于没有证据。

即使如此，我们相信本书和其他地方（请见以下关于新著作的一节）已经提出了足够坚实的经验证据作为根据来肯定我们所主张和分析的一个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的非—欧—亚单一体系早在5000年前就存在了。这个体系的整体发展与转型有助于形成和再形成其中的大多数部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与整个体系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不但有必要研究比它各部分的总和更重要的整体，以便了解过去或现在的整体，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进一步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对它的任何部分在任何时间有最低的足够了解，那么同样必要的是要研究任何一段时间的整体情况，不论是中国或欧洲或北美或任何其他地方。如果这个全盘要求早在几千年前就有，那么我们更必须以此观察全球发展，以便今天去了解任何部分并进行政策选择。

二 新的著作

自从我们在10年前写本书以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我们也愿意告知中国读者。所以我们要求同行们每人写个段落，总结他们过去10年中自己的有关工作。他们写的内容如下：

美国的罗伯特·德内马克报导出版了一本关于我们在瑞典隆德一次会议的会议录。该书题为《世界体系的历史：长期变化的社会科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它的编者是罗伯特·德内马克、乔纳森·弗里德曼、巴里·K. 吉尔斯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该书旨在作为跨学科研究历史最长期全球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继续与变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它包括关于世界体系史学者主要观点的四章，由冈德·弗兰克和吉尔斯、莫德尔斯基、威尔金逊、蔡斯-邓恩和霍尔撰写；关于长期观点中特殊地区的五章；以及关于包括信息、环境、生产力、战争和世界城市在内的全球宏观历史进程的五章；最后两章提出了世界体系史研究中的比较、积累和未来方向。

该书是这组人士到目前为止的主要产品，他们已经组成了

一个专业协作组："世界历史体系组"，在过去10年中每年聚会一次，起先由罗伯特·德内马克主持，然后由巴里·吉尔斯主持。在瑞典隆德的一次特别会议导致了上述一书的出版。第二次会议计划于2003年9月在该处举行，主要集中讨论生态问题。一项类似的倡议将更加向中国同行们开放，那是长期历史变化问题，因特网研讨组网址为：http：//www.longtermchange.net/，欢迎中国学者在网上提交他们的著作和他们同行的著作。

美国的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在《主导部门与世界大国：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共同演进》（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6）一书中扩大了他们早先对全球政治长周期的集中关注，把他们对前后相继的主导经济社会的观察推前到10世纪至12世纪的中国宋代经济现代化。后来的研究集中于开创一个"世界体系演进"的模型以及过去5000年中的长期波动并根据经验数据加以验证（载德内马克所编的上述书中）。还研究了东亚，并以苏美尔为出发点对城市化和中心—腹地相互影响使用了新的数据和深入观察（载《实践中的世界体系理论》，P.N.卡杜里亚斯编，1999；以及《结构、文化与历史》，S.C.丘与P.N.克诺特勒斯编，2002；此两书均由罗曼与里特尔菲尔德出版社出版），也可上网查阅〈http：//www.ancienteastasia.org/special/ancientwor/dcities2.html〉。

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来信称：我在世界体系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还是我的书《史前的欧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我在书中提出中心与外围之间每300～400年间隔的一种周期变化。国际交往、接受新技术和价值体系的时期转变为没有国际交往的时期（有些是中心地区结构重组的黑暗时代），其特点是欧洲外围的移民及社会变革。现在我正在研究识别在早期青铜器时代新体制从地中海中心转移到欧洲的问题。我识别了这一时期中从印度到西欧的神圣双头制和双头统治制作为一

种主宰的政教合一体制，那是我的文章《统治者与武士：青铜器时代欧洲的象征性转移和社会转型》，刊载在乔纳森·哈斯主编的《从领袖到统治者》（克卢沃学术/充实出版社，2001年）。

戴维·威尔金逊在加利福尼亚报告称：自1993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描绘历史性世界体系的时空疆界；找出非洲的小范围、短时间以及被忽略的世界体系；验证和总的肯定A.G.弗兰克提出的某些不用数据的阶段计时法；并以时间描绘主要世界体系的极性结构，这是尚在进行的一项长期事业。我排列过它们权力结构的那些世界体系中有远东的，那是从公元前1025年到公元1850年，按每25年的间隔。对那个体系，我也观察了它的系统自主性的现实与持续。

也是加利福尼亚的丘星（音译）写道，对于5000年的积累、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长期生态变化和危机，努力进行了解和分期。生态变化和危机已经通过观察黑暗时代的周期性和性质来加以分析，所谓黑暗时代指的是长期的世界体系演变。黑暗时代是（物质的和政治的）再分配的时代和世界体系的生态复壮时代。这些研究发现已反映在《世界生态衰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2000年）》第一卷（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1年）以及即将出版的第二卷《黑暗时代：生态压力与社会转型》。

美国的约翰·麦克内尔报告称：在即将问世的《人类网络》一书中，他和威廉·H.麦克内尔把几千年的人类经历组织为包罗信息、技术、信仰、植物、动物、疾病等等等等交换与流通的互动网络。虽然全体人类在一个层次上联系起来了，但在历史上更有力的相互作用是在较小的互动网络上发生的。这些将随时间推移而成长并融合，这往往是残暴的事情，但在过去500年间变得越来越统一和全球性了。

美国的托马斯·D.霍尔长期以来活跃在长期社会变化的研

究上。除了他的大量文章以及与克里斯多弗·蔡斯-邓恩合著的两本书《比较世界体系的兴亡》（西方观点出版社，1997年）和《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围关系》（西方观点出版社，1991年，现已绝版，但IROWS在线可查到）。他是《世界体系读物：对性别、城市主义、文化、土著人和生态的新观点》一书的编者。和苏珊·曼宁一起，他们出版了《东西方兴衰的共时性和印度例外论再研讨》，载《社会科学史》第24卷第4期（2000年冬）。霍尔的大多数著作围绕着土著人口和全球性国家与非国家关系。他对游牧民族在长期变化中的作用有强烈兴趣。他也与生物生态学家彼得·图尔钦合作著文主张使用人口生态学模型来对长期变化取得更多洞察（即将在电子学的《世界体系研究杂志》上发表）。他的出版物的目录可查阅他的网站 http://acad.depauw.edu/thall/hpl.HTM。

瑞典的阿尔夫·霍恩博格在《机器的力量，全球经济不平等，技术与环境》（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认为，当高质能源与“负熵”（即“秩序”）远距离交换时就引进了一种新的体系逻辑。早期的例子包括地中海的谷物贸易养育了希腊人和罗马奴隶，这加强了雅典和罗马基础结构（秩序）的建立而牺牲了北非的生态复杂性。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生同样牺牲了佐治亚的生态系统与土壤、西非的社会结构、斯堪的纳维亚的矿藏与森林等等。由于证明无法以热动力来对这一逻辑进行量化和经验展示——虽然热动力对于分析性掌握它很重要——霍恩博格提议我们可根据时空的不平等交换（人类的时间和大自然的空间）来思考。中心地区的技术基础结构为全球少数人节省了时间（增加速度）和空间（精打细算的土地利用），但牺牲了外围地区的（劳动）时间和（大自然）空间。

乔纳森·弗里德曼在瑞典写道：弗里德曼致力于分析古代地中海与中东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其中再分配关系与威望

关系的类型掩盖了在更大的全球体系中组织的强大商业化经济，其抽象财富的重大积累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这些研究也强调了存在着霸权扩张与收缩周期，这有关变化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以及极其类似于现代世界的若干进程。

凯沙·埃克霍尔姆也在瑞典，他已完成了一部关于公元前2000年至1200年青铜器时代的书稿，它追溯了希腊、西南亚与埃及之间的系统关系。它表明周期扩张/收缩如何最终导致了青铜器时代的整体崩溃和结束。此书也是一项有关“作为历史的未来：对霸权衰落的人类学比较分析”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它包括其他一些次项目：整个罗马帝国中的希腊时期，以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世界体系。埃克霍尔姆与弗里德曼也一方面分析了中非与太平洋岛屿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及欧洲的殖民扩张，这表明当代社会与文化形态如何在那世界体系内涌现。

美国的克劳迪奥·西奥菲-雷维拉建立了战争长期分析计划（LORANOW），现在指导着新的社会复杂性研究中心（http：//socialcomplexity.gmu.edu）。战争长期分析计划已经从它原先集中于衡估和制作战争长期动力的模型扩大为重点集中于记录和制作政体系统及其网络的起源与长期动力的模型。一本四卷集的古代政体手册（西亚、东亚、安第斯秘鲁和中美洲）在撰写中。调研通过计算方法（基于动因的模拟法和基于电脑的制图法）继续进行。战争长期分析计划的档案储存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其网站为http：//vdc-prod.hmdc.harvard.edu/vdc/index.jsp。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到关于中国本身的一些新近著作：修正中国古代史的一种观点正在开始流行，反对北方单一中心认为黄河流域最先发展、然后向外扩散到其他地区的老观点。相反，中国同行们现在正在辩称，考古证据表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